

人民的西湖：毛澤東時代的宣傳、自然與能動性（1949 - 1976）

The People's West Lake: Propaganda, Nature, and Agency

in Mao's China, 1949 - 1976 / 何其亮

《三十·三十书系》编者按 群峰并峙 峰峰相映

1. 三十为一世，而道更也；
2. 书系期待群峰並峙，自然形成充滿張力的對話和問辯，而峰峰相映，帶來更為遼闊和超越的認識景觀；
3. 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中文版序言&导言

1. 為了應對可能隨時來襲的細菌戰，政府發動群眾進行愛國衛生運動，以期消滅一切有害人類健康的生物，如蒼蠅、蚊子、老鼠等等；
2. 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這一人類中心思想（為一種人類中心的傲慢：人類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壓制、改造、重塑、操弄自然界）變成一種經濟原則：自然界萬物都可以成為投放到市場上的商品；
3.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謂之「高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
4. 建國後許多重大工程都以群眾運動的形式宣傳，既征服自然，也改造人群。1950年的治理淮河工程便是最早在全國範圍得到宣傳的群眾參與工程之一（彰顯了毛澤東時代特有的那種改天換日、再造自然環境、克服歷史宿命的新時代英雄主義）；
5. 自然界不是靜止、被動的，也不是可以被「計劃經濟」隨意安排計劃的。人「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必然會遭遇物的「反作用」，或高王凌所謂之「反行為」；
6. 《人民的西湖》試圖更好理解人類規劃與自然界應對間的互動與糾纏。為此，本書採用「非人類研究」的思路，強調非人類特有的「能動性」如何貢獻或者阻礙於共和國時期政府改造西湖的努力；
7. 本書強調參與社會主義事業的不僅僅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基層群眾與幹部，更是我們常常忽略的非人類（如水、淤泥、微生物、樹木、害蟲以及豬等等）。本書強調，無論人類抑或非人類，他（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共生、糾纏、互相限制又互相成就的**；
8. 本書希望傳遞的信息是，只有全面呈現人類與非人類的協同、衝突、互相適應與相互成就，才能完整地理解與描述歷史。歷史的錯綜複雜除了變幻無常的人性之外，自然界的不可預測、難以捉摸也是重要因素；
9. 我（作者、上海交通大学本科）研究過的題材包括表演藝術（評彈）、報紙和新聞、小說與電影，都是我從小就極感興趣的內容；
10. 景觀歷史研究（landscape history）、非人類研究（nonhuman studies）；
11. 馮麗達（Krista Van Fleit Hang）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人民」是政府部門職位和組織機構的修飾語，用於傳達一種「新中國誕生的樂觀情緒」。「人民」一詞貫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適用於各類不同的政治環境，構成了中共政府的權力合法性來源；
12. 国际主义下的神秘实体；

13. 本書著重介紹共產黨治下的新政權如何通過重置空間、重塑景觀（包括風景性景觀和生產性景觀）以及改造文化來打造「人民的西湖」；
14. 本書將綜合討論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在西湖地區推行的五項舉措：西湖疏浚工程、花港觀魚公園建設、植樹造林運動、西湖地區村莊集體化養豬事業，以及西湖周邊的兩次平墳運動；
15.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人民」既是「統一政體的公民綜合體」，也是被領導階層的成員；
16. 作為南宋（1127–1270）都城（稱為「行在」或「行都」），杭州是南宋盛衰興敗的一個縮影。南宋滅亡後，杭州成為「中國的文化地標」。與此同時，由於持續不斷的疏浚和維護工程，西湖在千年中渡過了嚴重淤積和沼澤化的危機；
17. 政府雄心勃勃的城市開發工程和工業化項目往往受到「舊的歷史因素」的制約；
18. 大衛·布蘭登勃格（David Brandenberger）進一步豐富了宣傳國家的概念，他建議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評估宣傳的效果——「製造、輸出和大眾接受」；
19. 「propaganda」一詞雖在英文中常含貶義，但在中國政治和文化的語境中卻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常用於翻譯「propaganda」的中文詞彙「宣傳」，意指「宣揚自己認為正確的理念，含有宣揚正統觀念的意味」；
20. 一種「革命的新語言」，包括「激進的口號、愛國歌曲和政治術語」，為新政權提供了「一種有力的溝通工具」和詮釋方法；
21. 理解民族主義認同的宣傳言論，參與「集體生活」以及關心「國家命運」，為年輕一代提供了一種「藝術性體驗」；
22. 賀蕭（Gail Hershatter）認為，由於家庭時間和運動時間在婦女的日常生活中糾纏在一起，「政治變革的官方敘事」並不能還原個人或社群生活的全部，個人的敘事也相當重要；
23. 所謂人與自然的對抗關係，源於自啟蒙運動以來在歐洲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與自然二元論」概念；
24. 諾埃·卡斯特利（Noel Castree）指出，自然已經內化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因為「自然的生產是一個持續過程，在此過程中，自然和資本在時間與空間上以各種不同而偶然的方式共同構成彼此」；
25. 另外一些學術著作重新審視了中國計劃經濟為何有時收效不佳，其中主要強調人的因素：黨員的背景、動機和志向各有殊異，技術人員的缺乏，以及群眾和下級幹部不服指令；
26. 借安迪·布魯諾（Andy Bruno）之語，自然界「本身就是共產主義工程的參與者」；
27. 作者強調能動性力量在**連接**人與非人類方面起到的紐帶作用；
28. 如果能動性僅以意識和目的來定義，人們就有理由否定非人類的能動性；

第一章 水、人与微生物：1950 年代的西湖疏浚工程

1. 1952 年，浙江省與杭州市政府啟動了一項大規模的公共工程——疏浚西湖，該工程投資高達 453.83 萬元（以 1955 年新人民幣值計算）。至 1958 年，西湖平均水深從約 0.55 米增加到 1.80 米，儲水量從 300 萬立方米增加到 1,000 多萬立方米；
2. 布魯諾·拉圖爾對「不順從」（recalcitrance）的定義：「不受掌控，阻礙（他人的）主導」；
3. 高敏：儘管毛澤東時代往往強調群眾動員和「群眾科學」是社會主義成功的關鍵，但真正起作用的卻是現代科學技術和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
4. 在古代，清除出來的淤泥通常被重新使用以建造堤壩。這樣，原本來自湖床的微生物因此得以繼續留存在湖中，其中很多都是那些殺藻抑藻的微生物（**生態平衡**）；
5. 勞工既沒有接受到意識形態的教育，也沒有獲得金錢上的獎勵，導致他們「抱著混飯吃的態度來對待運泥」；

6. 挖深湖底導致「大量肥料被釋放了出來，沒有水草來利用這些肥料，因此使低等水生植物（如藻類等）有機會大量繁殖」；
7. 「群眾科學」即「鼓勵農村領導人進行實地調查，收集研究數據，找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
8. 「群眾科學」的廣泛應用旨在針對「知識精英主義，力求化解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化」；
9. 一類典型工程 — 「付出成本（包括機會成本）超出其本身價值」；
10. 彼得·凱內斯指出，宣傳不是為了說服「人們去做違背其意願之事」，更多是為了界定何為共產主義政權下的政治制度；

第二章 花港观鱼：毛泽东时代的景观、空间与日常性

1. 人為設計的景觀（即公園或花園）一直被視為「對自然的模仿」，但它絕非獨立於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人工製品。它既能夠闡明人與特定地方的關係，也因此用以展示人類與自身的關係。換言之，景觀與意識形態的聯繫十分緊密；
2. 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指出，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即日常生活中人們在特定場所內居住、使用、行走所「開展的一系列活動」，能夠創造出異於規劃者所設想的空間；
3. 公園提供了一處「記憶之地」，但並非所有人都同樣享有；
4. 如果說在設計者與學者、詩人心中，文化懷舊的需求高於空間政治化，那麼本地普通市民也並不一定與文化精英共享同樣的記憶，而是以多種多樣的方式「使用」這一公共花園；
5. 如羅伯特·羅滕伯格（Robert Rotenberg）所言，景觀本質是許多「聽覺」和「視覺」之間的「對話」；
6. 在毛澤東時代的花港觀魚公園，不同的行動者懷著不同的意圖，在這座公共空間裡各行其是，創造出各自的政治空間、話語空間、記憶空間和生活空間；
7. 先有山水畫，後有（西湖）十景；
8. 1731年李衛等編纂的《西湖志》生動描繪了新建成的這片矩形池塘內的景象：「或潛深淵，或跳清波，以泳以游，咸若其性」，「落紅千片，飛墜水面，與朱蘊碧藻，點綴映帶」；
9. 中蘇出現裂痕那段時間，我們不難理解，這一時期也是復興中國「傳統」的絕佳時機；
10. 在大多數情況下，花、魚、茶都是為政治之旅事先安排好的必要道具；
11. 個人為了各自的利益，對官方言論和實踐進行創造性利用；

第三章 森林、宣传与能动性：1950-1976年杭州的植树造林运动

1. 大躍進初期，全國上下普遍相信農業產量正呈指數級增長，因此政府有意將一部分農田改做其他用途，這便是「大地園林化」這一理念產生的時代背景；
2.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植樹造林都與政府權力集中有關，即推進國家建設工程，從而達到「重整國家權威」的目的；
3. 在1949年後的中國存在「兩種不同的真相」，一種是「對社會主義的樂觀主義」，另一種則是對毛澤東時代政府「未能兌現一些社會主義承諾」的遺憾；
4. 安妮·惠斯頓·斯本（Anne Whiston Spirn）所言，「人類並非景觀的唯一創造者」；
5. 植樹造林運動體現了建國初期一種獨特的生產方式—通過大力提高勞動投入，在不付出高昂經濟成本的情況下克服物質資源稀缺的問題，高敏稱這種做法為「群眾工作」；
6. 加快植樹造林的最佳方案並不一定是加大勞動力投入，而是選擇速生樹種，尤其是馬尾松；

7. 重拾中國文化傳統，選擇具有文化意涵的特定樹種，在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集團內部也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影響：在政治普世主義（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背景下，也需要突出各個國家的民族特性；
8. 現代科學林業的特徵是「除草徹底、樹齡均勻、成行種植」；
9. 人為和非人為因素與規劃者、林業工作者相互博弈，不斷削弱西湖地區植樹造林工作的成效，改變造林的方針；
10. 在杭州的「大地園林化」運動中，茶葉通常並未被視為經濟作物；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年後，茶葉兼具飲品和禮品的屬性，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升高，杭州地區茶葉種植的影響力也因此與日俱增，茶園面積的增長也在情理之中；
12. 西湖人民公社下屬十幾個村莊（集體化時期稱生產大隊），遐邇聞名的龍井茶名字來源地的龍井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個以出產龍井茶聞名海內外的是梅家塢；
13. 「發動群眾」、「群眾運動」是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一個顯著特徵，上述引文卻是與「發動群眾」有效性相對的反敘事，證明國家宣傳的意圖與宣傳運動參與者的日常現實之間不一致；
14. 蒂莫西·約翰斯頓（Timothy Johnston）的觀點：在社會政治化的環境下，公民大多數「只是得過且過」，既不熱心支持也不反對國家主導和推動的政策；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猪：毛泽东时代杭州的肥料、集体化与文化遗产问题

1. 本章標題的靈感就來源於安德森對過去兩百年美國養豬業的研究成果，即《資本主義的豬：美國的豬、豬肉與權力》；
2. 毛澤東：「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也是肉類和工業原料的重要來源。對於毛主席來說，這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先決條件；
3. 「群眾工作」的典型特徵，即增加密集型勞動投入，以彌補技術與管理的不足，實現自給自足的目標；
4. 1957年4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一篇專門文章，公開抗議家豬長期非法佔用西湖孤山上著名的辛亥革命烈士徐錫麟（1873–1907）的陵墓。這篇諷刺文章的題目〈鴨子和社會主義，歷史文物和迷信，豬和徐錫麟〉，也是本章標題的另一個靈感來源；
5. 鑒於豬在中國農業和經濟政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現有對養豬業社會政治影響的研究並不充分；
6. 由於地方幹部積極推廣集體化運動，在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各地減少甚至取消自留地，農民「繼續殺害生豬家禽，（或者）疏於照管，任由牲畜死亡。由於合作化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權不確定性，生豬數量從1954年起已經開始下降，農民的做法更加劇這一衰退趨勢」；
7. 在建國後若干年內、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要達到《人民日報》社論設定的理想狀態，困難重重；
8. 彭麗君指出，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勞動模範是一種崇高人物，他們體現了「毛澤東思想，並鼓勵人們模仿，以獲得革命精神」；
9. 豬與歷史人物的空間之爭，見證了建國最初的27年間杭州城市規劃的內在矛盾；

第五章 「与鬼为邻」1956-1965年西湖地区的迁墳（坟）运动

1. 自辛亥革命以來，隨著杭州城牆漸次被拆除，西湖對於杭州城市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它從杭州的偏遠郊區，一躍成為城市的核心地區；
2. 在首都北京，政府通過改造北京城市空間，能夠「既創造過去，也創造現在」，「既代表過去，也代表現在，既代表人民，也代表歷史」；

3. 葉夫根尼·多布倫科 (Evgeny Dorbrenko) 則指出了共產主義社會中時間性的雙重性，即對過去的「破壞與博物館化」二者並存；
4. 保護墳墓的積極分子與企圖清除墳墓的激進派並非完全相互對立，而是一體兩面，都是政府為追求政治目標而重讀、重釋歷史的策略；
5. 名人墓葬是西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體現出西湖「陽剛之氣」（民族英雄的豪氣干雲）和「陰柔之美」（西湖愛情故事中的纏綿悱惻）的完美結合，這些墳墓很快也將重新煥發生機；
6. 平墳的破除舊文化運動之所以始終未竟全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湖和墳墓皆有其自主性：西湖的永恆之美在於千百年來人類與非人類、環境與文化、生者與死者之間不斷的相互作用；
7. 汪悅進 (Eugene Wang) 的說法，墳墓是一種「topos」。這個古希臘語單詞具有兩重意義，既是「地點」也是「主題」。Topos「可激發相關的寫作、引發話題性的思考，鑄刻在集體記憶中」；
8. 逝者埋骨西湖邊上成為他們的榮譽；反過來，這些名人墓葬也為西湖增色。西湖和墳墓共同進化，互相成就，其聯繫無法輕易割斷；
9. 它們不僅存在，而且引發了如何銘記過去、利用過去的爭論，並因此支配著現實世界人類的思想和活動，從而影響並重塑了黨和國家的政治文化政策。換言之，它們「反作用於」人類；
10. 法拉斯卡-桑波尼 (Simonetta Falasca-Zamponi) 指出，墳墓體現了歷史的敘事，既講述歷史中發生過的「行動」，也直接導致歷史行動的產生。它既象徵著權力，也產生了權力；
11. 簡·貝內特所言，「人造物品」有能力「超越其作為物品的地位，表現出它們的獨立性和生命力，構成我們自身經驗以外的東西」；
12. 中共將章太炎墓定義為文物，遵循了二十世紀以來將「文物視為國家遺產」的傳統，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歷史上的連續性，提升其政權的合法性；
13. 建國後 17 年國內歷史學觀點的兩個潮流——「階級觀點」（以階級鬥爭觀點分析中國古代歷史，並解釋中國歷史的演化）與「歷史觀念」（強調歷史分析與解釋不能脫離歷史當時的具體條件）；
14. 毛澤東時代歷史學經歷了從「學科化」（即「努力將中共歷史學家提出的革命敘事轉化為對中國歷史的標準化敘述」）到「激進化」（即將革命敘事推向「極端形式」）的過渡。最後，學術界的「歷史主義」或「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讓位於更為「激進的歷史學」或極端的「階級觀點」——即「簡單化的善惡二分法，或革命與反革命」；
15. 舒衡哲 (Vera Schwarcz) 在對中國園林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樣，「來自遙遠過去的聲音繼續訴說著我們今日的困境」；
16. 拆除西湖墳墓的激進計劃體現了一種浮士德式 (Faustian) 的發展模式，自斷退路，勇往直前，創造一個新社會，「沒有回頭路可走」；
17. 儘管激進派不遺餘力地反對墳墓，但歷史上埋葬在西湖的魂靈並未輕易消失：它們不再困擾著生者，反而有助於西湖相關的旅遊業實現商業利益，並明確定義了西湖應該為何、西湖應代表什麼；
18. 正是生者與逝者之間的不斷互動促進了西湖的形成和發展；
19. 黃裳的評論，一些墳墓注定消失，其他墳墓則會以一種更加「自然」的方式留存下來，無需太多人為干預。墳墓的興衰遵循著各自的規律；
20. 人類的努力也許可能改變這種規律，但只是暫時的；
21. 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之語：激進派能夠摧毀「有形的物體」，卻未能消除集體記憶中「具有精神意義的東西」；

结语

1. 公允的說，政府實現了預先設定的大多數社會政治目標。這些項目的成功雖然有目共睹，但由於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其成功付出的代價也不小；
2. 新政權往往將對於改造自然以及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歸因為人「意志」的體現，而「意志」是毛澤東主義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3. 人類或者非人類的能動性往往是一種「反行為」(counteraction)，是「表現式」或「非目的性」的；
4. 尤爾恰克(Alexei Yurchak)的研究表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壓迫與反抗」、「壓制與自由」、「國家與人民」、「官方文化與反文化」等二元對立的敘事都是事後的人為建構，無法揭示當時真正個人的生活經驗；

2024.07.23

阅毕